

2026年3月10日上午,在浙江省平湖市乍浦镇的港区图书馆里,胡家后人捐赠了乍浦籍中国著名女翻译家胡湛珍的《外国名作家传》《外国名剧故事500》《果戈理和他的创作》等三套共七本翻译著作,圆了她45年的夙愿。



从乍浦走出去的女翻译家

■钟峨

『谁是胡湛珍』

1934年,乍浦镇。海风裹着咸腥味穿过萧山街的石板路,胡家的杂货铺里迎来他们的第九个孩子。父亲胡梅轩在萧山街与海塘街交界处开着两间门面的杂货铺,勉强糊口。他看着襁褓中的女婴,随口起了个小名:“小镏。”母亲张金英生育了十个子女——四子六女,这个排行第九的女孩,就是后来的胡湛珍。

新中国成立前,女孩读书是件稀罕事。胡湛珍上面的三个姐姐几乎没有读过多少书,唯有四姐“大镏”胡雅珍幸运些,进了乍浦中心小学,那原是清乾隆时的观海书院。苏州园林风格,三层楼的“魁心阁”是教室。轮到胡湛珍时,她去了城外一所学校,校舍设在乍浦镇南五都元帅庙旁,据说这是当地有名的“双枪黄八妹”办的学校。孩子们不懂这些,只觉得她的名字听起来比庙里的像还吓人。

课余时间,孩子们经常隔着门缝去偷看庙里的像,别的孩子都有点害怕,唯独胡湛珍却不怕。家人们都说她从小就胆大,思想也独立。这脾气,一辈子没改。

1937年11月,日军从杭州湾北岸登陆,乍浦沦陷。战火很快撕裂了乍浦的宁静,也打乱了胡家的生活。1941年4月,日军再次进攻,胡家杂货铺被烧成白地。家徒四壁之际,哥哥们外出闯码头,去上海当学徒。“大镏”和“小镏”两姐妹随后也投奔到上海的大哥家。

1949年,上海解放。红旗插上外滩高楼的那天,胡家两姐妹也挤在人群中看游行。

次年,抗美援朝战争爆发,街头的广播里喊着抗美援朝前方缺血,街上人群面面相觑,没人敢挽袖子——那时候老百姓认为抽血要伤元气,是要折寿的。胡湛珍却勇敢地站了出来,第一次就献了400毫升血。针头扎进血管的那一刻,她没觉得疼,只觉得自

己的生命,从此和国家连在了一起。

部队首长见她胆大又有文化,问她愿不愿意随部队担任志愿者。她点了点头。这一点头,便把自己点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。

与此同时,“大镏”胡雅珍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——她眷恋母亲,回了乍浦。临走那天,她回头看着送行的妹妹,以为只是一次短暂的分别,没想到从此两姐妹走出了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。一个守在母亲身边,在乍浦海塘街上开店,后去了嘉兴、昆山教书;另一个随部队来到鸭绿江边,走进了一个从未想象过的世界。

胡湛珍因能写会算被挑中去学习俄语,进入哈尔滨外国语学院俄语系。195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,1959年毕业后,被分配至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(1977年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)文学研究所。

胡湛珍在学习俄语期间,课余时间,认识了一位在苏联留学的解放军青年学者,叫胡效良。一文一武,两条江河在异国交汇,汇成了同一个家。从此,他负责保卫国家,她负责翻译世界。

他们婚后住在北京朝内大街的单位宿舍。当时屋里没什么像样的家具,大多是从中科院借用的公家家具,桌腿椅背上都印着“中科院”三个字。但有一件私人家当,格外扎眼——一张厚重的实木写字台,桌面宽大,抽屉结实,是从乍浦老家托运来的。这是三哥胡文钊心疼这个远在北京的妹妹,知道她“只会看书,不会过日子”,特意在乍浦请木匠打好,火车托运到北京的。这张从乍浦运来的写字台,放在那些中科院配发的旧家具中间,显得有些格格不入,却又那么倔强地存在着。

在北京安顿下来后,胡湛珍的人生围绕着三件事展开:事业、生活、亲情。

『事业·痴』

1959年,胡湛珍进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,开始了她一生的翻译与研究事业。在这里,她的同事里有钱锺书夫人杨绛——那是中国学术群星璀璨的年代。胡湛珍曾担任过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的秘书,1964年文学所分成两个所,把研究外国文学的那些人都分到外国文学研究所去了,胡湛珍也就去了外文所。

据在昆山的四姐胡雅珍回忆,1969年,胡湛珍与杨绛先生同一批被下放到河南信阳的五七干校。胡效良在部队不能离岗,她独自在干校参加农业劳动。一个柔弱的女书生,干着庄稼人的活——挑担、插秧、割稻。

后来她很少提起那段日子,只在一次闲聊中说过一句话——与杨先生一样,在信阳度过了一段刻骨铭心的岁月。

最难熬的是夜里。收工回来,浑身散了架似的疼。她躺在硬板床上,盯着黑漆漆的屋顶,想女儿。两个女儿寄养在上海嘉定的婆家,一家四口,分在三处。平时很难得到孩子的消息——胡效良的哥哥从上海虹口去嘉定探望两个侄女,再把情况告诉在邮电局工作的姨甥(大姐的女儿),接线员工作的姨甥通过内部线路传给胡效良,胡效良再写信告诉她。每一句话都辗转千里,到她手里时,孩子已经又长大了一点。她捏着信纸,反复看:大的学习还好吗?小的有没有生病?想着想着,眼泪就滑进枕头里。

两年后,胡湛珍总算回到北京。行李很简单,只有几件换洗衣服和一摞厚厚的读书笔记——那是她在干校最大的收获。

1977年秋,一个具有拨乱反正意义的学术项目启动了。彼时,外国文学研究领域许多外国作家被贴上“资

产阶级”标签。胡湛珍与张英伦、吕同六、钱善行共同组建《外国名作家传》主编团队,决心以科学的态度为外国文学名家正名。

这是一场思想的破冰。在改革开放初期,对纠正外国文学评价标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。他们顶着压力,组织近二十个语种同事撰稿。胡湛珍负责苏俄文学研究部分。

经过两年多的努力,《外国名作家传》于1979至1980年陆续出版,共收录四百余位外国著名作家传记。中国现代文学巨匠茅盾题写书名,著名翻译家、画家高莽为每位作家绘制插图。作品能够得到茅盾先生的认可,胡湛珍觉得自己这个从乍浦小镇走出来的女孩,再苦再累也心甘。

此后,她一鼓作气,主编了《外国名作家大辞典》《外国名剧故事500》(后者于1988年获全国优秀图书奖),译著《女商贩和诗人》(合译)、《我是托克松的儿子》,著有专著《主要的角色》。1984年,她加入中国作家协会。

胡湛珍工作严谨、刻苦,一丝不苟,又具有奉献精神——从学生时代献血就能看出这股劲头。刚参加工作不久,她就接任所长秘书一职,后来担任外文所科研处处长、副研究员、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秘书长,负责协调商议全国学会事宜。

从她写给学者王远泽、张铁夫的信件中,可以窥见她工作作风的另一面。工整的字迹里,讨论的是上世纪80年代筹备“苏联70—80年代文学讨论会”的种种细节:时间怎么安排,经费如何筹措,如何避开疫情,怎样开源节流。一笔一画,细致周全——她不仅是学问精湛的学者,在行政协调上也是一位行家里手,事无巨细,亲力亲为。

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本色,正在于此:既能仰望星空,也能脚踏实地。

『生活·简』

改革开放后,中国变了。

经济好转后,胡湛珍给女儿买了架钢琴。那是他们家最值钱的东西。每天晚上,除了女儿练半小时钢琴,全家收看半个小时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,剩下的时间,大家各自都在看书学习。那张写字台上,永远堆满了俄文原著、译稿和笔记。

有一次,胡文钊来北京看她,环顾四周,叹口气说:“你们这个家,只知道读书,人家都是追求万元户,书

胡家十个孩子,分布天南地北,北京、天津、上海、江苏、浙江、香港,永远聚不齐。

1970年父亲去世,兄弟姐妹只聚了七个。胡湛珍因没买到火车票,等赶回乍浦老家,已经错过了出殡日的四天。她一进门就一头栽倒在地,跪在父亲遗像前,没有哭出声,只是肩膀剧烈地颤抖。半晌,才憋出一句:“阿爹阿爹,我来迟了,女儿不孝啊……”现场的人无不落泪。这份遗憾,她深深藏在心里。

1975年母亲去世,兄弟姐妹也只聚了九个。因妹妹是从香港过来的,胡湛珍却因为中共党员身份,当时还不便与海外关系亲属接触,最终只能缺席,没能看上母亲最后一眼,也是永远抹不去的痛。

1981年上海侄子胡跃进婚礼,兄弟姐妹聚了八个。胡湛珍也因工作任务脱不开身,再次缺席。弟兄姐妹的“十全十美”,成了胡家最大的遗憾。最重大的三次团聚,都缺少胡湛珍的身影。

但她并非不念亲情。虽然不在父母身边,但时刻思念千里之外的父母,只能将省吃俭用节约出来的工资及全国粮票寄回乍浦。她知道,老家

又不能当饭吃。你那么有学问,怎么不想办法赚钱?”

胡湛珍只是平静地回答:“阿哥,你们追求做万元户,我们追求不同。我最开心的就是出版书。”

她的追求、她的一生全在书里。生活中的一切,都可以马虎——剩菜舍不得扔,放冰箱里下顿接着吃;腌菜、咸肉、腐乳,这些从小吃惯的东西,成了她的家常下饭菜。唯有对待学问,必须精益求精。



『亲情·深』

孩子多,口粮不够,她人回不去,就让粮票替她回去。

她用家人团聚的缺席致力国家文化的发展,又用寄回的钱和粮票弥补着无法尽孝的亏欠。这是那一代人的大忠与大孝,也是他们最深的痛。

为集中精力投身学问,胡湛珍还给自己立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:因为兄弟姐妹多,后辈人数更多,所以在北京家中她不接待家族第三代。这并非她不重亲情,而是她太清楚自己的精力有限——如果总是接待来北京的亲属,她怕自己无法专注于书桌前的学问。她选择了用另一种方式守住亲情:把自己活成一个让晚辈敬重的榜样。

她用行动告诉女儿什么是专注,什么是追求,她告诫女儿“读好数理化学,走遍天下都不怕”。结果如愿以偿:她的大女儿胡越,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成为首批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,后被杨振宁教授招收去美国学习,成为美国康奈尔大学终身教授;小女儿胡红,上世纪80年代经美国联校招生赴哈佛大学本科学习,1989年毕业,并于1996年获得该校博士学位。

『书在,人就在』

上世纪80年代初,胡湛珍终于有机会回乍浦了。1981年,她应邀到苏州大学开会,顺便挤时间回了一趟老家。这是她十多年后再回到乍浦。

站在九龙山父母的坟前,胡湛珍摸着侄子张卫东(胡文钊的小儿子)的头,平静地说:“我没啥东西,等我死后,把我的书捐给乍浦小学和平湖县图书馆。”她说得十分平静,像是一件早就想好的事。

1994年,胡湛珍病了,癌症。发现得太晚——那些年被忽略的身体问题终于找上门来。化疗后,她的头发大把大把地掉。张卫东去北京医院干部病房见她最后一面时,看到的是掉光头发瘦得脱了形的姑妈。她拉着侄子的手,还是提到了捐书给家乡的事。那年10月,胡湛珍走了,享年六十岁。她还没有退休,更没有好好享受人生。她没有留下多少物质财富,留给后人的只是她一辈子翻译的著作。



四十多年后,她的书终于回到了家乡。

2024年11月12日,张卫东与旅居西班牙的胡湛珍的姨甥胡建安来到平湖市图书馆,捐赠了《胡氏家谱》以及《外国名作家传》《果戈理和他的创作》——主编者正是胡湛珍。

2026年1月,定居香港的妹妹胡雅娟又通过张卫东知道了五姐胡湛珍的遗愿,告知在美国的姨甥胡红,于是胡红马上将母亲的著作寄回家乡,委托表弟张卫东捐赠给乍浦镇。

如今,这些书静静躺在故乡的书架上。扉页上,“胡湛珍 主编”几个字沉默而清晰。

也许某一天,一个乍浦的少年会偶然抽出这本《外国名作家传》,在某个午后的阳光里慢慢翻开。他不会知道,写这本书的人,当年也曾是一个在乍浦街头奔跑的小女孩。

但没关系。书在,人就在。



上世纪80年代的乍浦港 杜镜宣 摄

